

翻译研究

戴着镣铐跳舞:对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诠释

——再论英汉语言中的不可译现象

陈友勋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2160)

摘要:创造性翻译与传统译论中的不可译现象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学界研究不可译性的文献资料表明,翻译究其认知本质而言,可译性是绝对的,不可译是相对的。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把不可译现象转换为可译现象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的关键是结合认知语言学中的语义概念化和概念整合理论。译者要生成具有相同或类似认知效果的译文,就必须准确把握源文蕴含的认知特征,将其投射到不同的心理空间,进行一系列的概念整合。

关键词:创造性翻译;不可译现象;认知转向;语义概念化;概念整合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2-0166-12

0 引言

“创造性”在翻译研究中并非一个新概念。早在20世纪中期,文学翻译领域杜撰的术语“**transcreation**”(Translation+Creation)很快蔓延到全球的传媒、营销和广告行业,成为翻译行业的“一种普遍实践”(黄德先等,2013)。近30年来,学者们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做了更多论证和阐述。2019年,柯尔斯滕·马尔姆克(Malmkjær,2019:3)专门撰写了一部著作,标题就是《翻译与创造》(Translation and Creativity),其核心内容是宣称“翻译并非创造性的从属活动,翻译活动本身就具有创造性”。国内对翻译创造性的研究也很热烈,很多学者将“transcreation”简称为“创译”,甚至有人主张用它取代传统的“意译”(王向远,2015)。谭业升(2012)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已经达成共识:翻译不可避免地带有创造性特征;在实践中,翻译一方面与一定的源语文本相关联,另一方面这种关联性具有不同的松动程度,体现在出于不同目的且不同程度的变化当中。然而,他也指出一个明显的弊端:学者们研究翻译创造性时,多侧重于语言的表象,而对创造的认知特性有所忽视。

收稿日期:2025-11-12

作者简介:陈友勋,男,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认知与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陈友勋.戴着镣铐跳舞:对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诠释——再论英汉语言中的不可译现象[J].外国语文,2026(2):166-177.

文旭等(2023)在对目前国内外研究翻译创造性的文献进行梳理时,还发现了另外一些不足,他们就此提出几条建议,包括:如果想对翻译中的创造性认知过程作出卓有成效的研究,就必须选择本身能体现语言创造性的文本,因为不同的文本类型会影响译者的认知加工,进而影响实验结果(de Groot et al., 1997)。埃里希·施泰纳(Steiner, 2021:352)也有类似见解:翻译产品反映了翻译任务执行过程中认知处理的结果,而产品与过程数据的整合可以互为补充,以完善我们对译者翻译行为的整体认识。

鉴于以上原因,本文在讨论创造性翻译之前,首先要对研究对象明确界定。本文要讨论的“创造性翻译”与前面所说的翻译中的“创造性”(为了表述方便,后文将其简称为“翻译创造性”)有联系也有区别。对于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性”字术语,周领顺等(2024)建议我们一定要严格谨慎,认真区分其内部的语义关系和范畴归属,澄清其不同的适用范围,从而促进中国翻译学科健康发展。笔者曾以这两个短语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搜索,获得篇名中包含前者的有63篇,包含后者的有187篇,但从内容判断,很多文章未对二者进行严格区分,甚至完全将它们混为一谈。但“创造性翻译”和“翻译创造性”其实是两个概念。一般而言,汉语中的“性”表属性,是抽象概念,属于理论范畴,比如这儿的“翻译创造性”就是在理论层面对翻译固有属性的一种总结概括,但它在与事实(翻译案例)结合时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形态,如评判译文的“忠实性”是一个理论标签,但它在实践中又可以细分出“忠实”“不忠实”和“叛逆”等更多形态。理论范畴的“翻译创造性”一旦进入实践范畴,就会随研究视角的改变而呈现某些具体特征,这在本文中被描述为偏正结构的“创造性翻译”,其中心词落在“翻译”,修饰语是“创造性”,从而表明它是“翻译创造性”的一种下位概念,侧重于实践范畴,关注的焦点是译者如何以非常规手段(“创造性”)克服翻译障碍并获取译文(“翻译”),借用郭建中(2014)的话来表述:“创造性翻译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发挥译者的创造性思维和语言能力,使目标语言更加准确地表达源语言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它对应于英语术语“transcreation”,强调翻译理论进入实践层面的表现特征,即“Transcreation highlights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 role”(wikipedia, 2023)。当然,诚如前文所述,任何翻译活动都离不开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区别只在于程度深浅或数量大小不同而已。限于篇幅,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广义的翻译创造性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相反,本文将要讨论的创造性翻译,首先是指译文本身具有创造性,更重要的是指该译文的产生过程体现出的创造性。也就是说,本文要研究的创造性翻译是过程和结果的辩证统一,所以衡量本文所说的创造性翻译也有两个标准,一是其译文质量相对较高,翻译效果往往出人意料;二是其操作过程超越常规的翻译思维、方法和技巧。为了同时满足这两个标准,本文准备从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入手,因为这相当于走一条捷径,同时也是基于一种极端思维:既然在翻译中出现了不可译的源文,说明译者已经不能基于常规的翻译思维、方法和技巧将其

译出;相反,一旦译者突破这层不可译障碍,其译文必然具有某种让人意想不到的表达效果,那么深入研究该译文的产生过程也许就能帮助我们窥探隐藏其后的思维规律和作用方式。

1 翻译中的“不可译”:从历史到现状

翻译中的“不可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理论层面的“不可译性”,二是实践层面的“不可译现象”。虽然本文选择以“不可译现象”为例,但对实践范畴的讨论始终必须结合其理论范畴才具有高度和深度,正如对理论范畴的讨论也必须结合其实践范畴才具有针对性和应用价值一样。所以,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学者们对“不可译现象”的讨论总是和他们对“不可译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在理论层面,“不可译论”,甚至“绝对不可译论”曾长期泛滥于西方,这主要受限于当时人们对语言意义、翻译标准以及翻译中“诸者”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源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译者与翻译赞助者)的理解。如果以客观主义语义观看待意义,认为译者是作者的传声筒,他的任务就是将源语文本中承载的所有信息完美地转达到译语文本当中,那这种翻译在布隆菲尔德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新洪堡学派的“世界映像”理论以及德里达掀起的解构主义面前,早就被宣判为不可能,从而戴上了“不可译”的紧箍咒。然而,解构主义以及后来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又通过颠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传统关系,认为译文虽然派生于原文,但又不是原文本身,而是原文生命的延续,二者平等互补,原文在翻译中获得新生,于是“不可译性”的理论根基开始瓦解,“可译性”以及“可译性限度”相继登台并成为主流。当然,这也给本文启发:在讨论不可译现象时,如果我们能在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转换或善于借鉴,比如把语言意义纳入认知框架,从语义概念化和概念整合的角度进行研究,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乔治·穆楠(Mounin, 1963:165)认为“翻译可行,但有限度”,并对翻译中存在的障碍进行客观分析,主张用科学方法加以克服。在他之后,中外学者借鉴跨学科理论对“可译性限度”展开研究蔚然成风。1965年,约翰·卡特福德(Catford, 1965:94)正式提出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对概念,并把翻译实践中的不可译现象归纳为两种类型,分别贴上“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两大标签,这对我国研究不可译现象影响较深。笔者在梳理文献时就发现,国内学界对“不可译现象”的讨论一般是结合中文语篇资料对他的二分法进行介绍,或在此基础上稍作理论延伸,扩展关于可译性限度的讨论。就国内讨论不可译现象的语料而言,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不可译”为关键词搜索发表在SCI、EI、北大核心、CSSCI、CSCD、AMI上的期刊文章,共找到68篇,其中43篇都是基于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

的翻译),鲜有涉及其他语篇类型,足以说明国内对不可译现象的研究范围相对较窄。

值得一提的是,朱安博等(2022)在梳理国内学者对不可译现象的研究历史和现状之后,认为其中有一个不足之处:我们目前对不可译现象的研究多为描写性研究,但深入到解释层面尚不多见。该结论其实和谭业升(2012)总结的我国在研究创造性翻译时存在的弊端如出一辙:重于研究语言转换的表面现象,而轻于对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不过,这倒是让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来理解二者的关系。既然国内学者研究不可译现象和创造性翻译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属于同一性质,这反而说明它们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认知特征,原本就应当放在一起研究。如此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在梳理的文献当中,学者们往往将不可译现象和创造性翻译相提并论。

限于篇幅,下面笔者将主要结合“语言不可译现象”来探讨如何进行创造性翻译。根据卡特福德的分类法,这种不可译现象主要是由于源文在拼写、发音或语法搭配等方面存在某些外在的、强制的,甚至物理的个性特征,而无法在译语中找到对应表达。下面以三则幽默故事为例,分别从语音、字形、意义的角度展示语言不可译现象。

幽默故事 1:

中国游客在英国汽车站向一位当地孩童询问下一趟车进站停留的时间,英国小孩调皮地用手比枪,瞄着他并大声嚷道:“Two to two to two two”,意思是 1:58-2:02。

这个故事中的时间就属于语言不可译,因为六个单词发音完全一样,听起来就像打机关枪一样,从而烘托出一个小孩子调皮可爱的形象,而一旦要翻译,由于这句英语的意义和发音不可能在汉语中同时保留,于是源文中浓浓的幽默感也就荡然无存,达到的效果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虽译犹未译也”。

幽默故事 2:

一名教授因有事耽搁,不能按计划给学生上课,于是他在教室门上贴了一则通知:“Professor Laurie will not meet his classes today.”结果有调皮的学生把“classes”前面的字母“c”擦掉了。教授回来后发现了学生的恶作剧,于是,把“lasses”前面的字母“l”也擦掉了。

这个故事之所以幽默,全是基于同一个单词发生的拼写变化,先后擦掉两个字母之后,其意义就被篡改得面目全非(class=班级,lass=情人,ass=蠢驴),所以英语母语者读了这个故事之后,都难免会心一笑,但在汉语中要找出一个字眼或词组,在字形上连变两次还能保持故事原来的逻辑,则难乎其难,因此可算因拼写引起的不可译现象。

幽默故事 3:

学生上课喧闹不停,气得教授敲着桌子喊道“Young man, order”,结果全班齐声回答“Beer”。

这是谐音双关造成的不可译:因为 order 既可以指(keep) the order,即在上课时守秩序,不讲话,这是教授的本意;又可表示餐馆用语,即店主询问顾客要什么东西吃喝,当然,这属于调皮学生的故意误解。

2 “可译”与“不可译”:从理论到现象

2.1 可译性是绝对的

尤金·奈达与查尔斯·泰伯(Nida et al., 1969:53)早就断言“翻译即译意”,尤利安·豪斯(House, 1981:25)则在博士论文中遥相回应“翻译的本质是在语言转换中保留意义”。认知翻译学应运而生,其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认知语言学。根据认知语言学大师罗纳德·兰盖克(Langacker, 2008:30)的经典理论:意义即概念化。联系到翻译,即是说,不管是源文理解还是译文表达,都是一种概念化过程。根据具身哲学的基本观点,这种概念化是基于主客观互动而形成的认知体验,所以翻译无异于在译文中再现源文的认知体验(陈友勋, 2011:23-25),或者就像王寅(2008)归纳的那样,翻译其实就是“体验性概念化”。此外,神经语言学的创始人悉尼·兰姆(Sydney Lamb, 1998:4)一再强调:任何对语言的研究都应当同大脑的神经事实并行不悖。艾伦·科林斯和伊丽莎白·洛夫特斯(Collins et al., 1975)推出的语义激活—扩散模型(semantic spreading-activation)能够很好地模拟大脑网络中神经冲动沿轴突、树突传递并激活其他相关神经元的生化过程,因此也为我们翻译中理解、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概念和概念整合等重要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如前所述,既然翻译的本质是在译文中再现源文的认知体验,那即使激活相同的认知体验,译者可以选择激活的语义节点—语法路径(对应大脑神经网络中的激活—扩散方式)并不唯一,甚至多种多样,这是导致翻译多样性的根本原因。这也说明,一门语言传达的任何意义,理论上都能在另一门语言中得以再现,这可视为翻译的绝对性,反映了认知翻译学与传统译论对待“可译性/不可译性”的一个根本差别。比如,对于前面讨论不可译性时所提到的例子“Two to two to two two”,译者至少可以进行这样的解释性翻译:一个小孩用手比枪,指着游客,一连嚷了七个“突”,听起来就像机关枪在开火。后来游客才明白,这个调皮的小家伙其实已经告诉了他火车到站的时间,因为英语里“突突”代表 1:58,中间的那个“突”是“到”的意思,而最后两个“突突”则表示 2:02。

同理,即使在译文的认知网络中,原本不存在和源文一样的激扩路径,但译者也可以选择将其直接保留,只是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额外添加一些节点—路径,从而让保留部分和译文的整个认知网络保持一种通达状态。比如翻译前面涉及“class”单词变形的例子,译者

可以采取“直译加注”的方式,将其翻译成:劳里教授在门上贴了一条通知“今天劳里教授不给他的班级(classes=班级)上课”。但调皮的学生看到之后,将“classes”前面的字母擦掉,于是通知就变成了“今天劳里教授不去约见他的情人(“lasses”=情人们)”。劳里教授回来看到之后,也想幽默一下,于是他把“lasses”前面的字母l也擦去了,于是整个通知就变成了“今天劳里教授不见他的那帮蠢驴(“asses”=蠢驴们)”。

以上两例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阐释性翻译。台湾的翻译家钱歌川(1981:9)早就认识到阐释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总结为“逻辑是翻译者的最后一张王牌,是他必须具有的基本要素”。显然这儿的“逻辑”无非就是“认知体验”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2.2 不可译现象是相对的

如果翻译的概念定义得过于宽泛,就混淆了翻译和写作、译者和作者之间的界限,让任何人都可能打着翻译的幌子,借人表己,夹带私货。换言之,如果翻译给译者过度的自由,让自己失去了个性,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着镣铐跳舞”的说法(Dryden, J., 1997)才在译界流传甚广,因为它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中必然承受的种种限制,也正是由于译者必须承受的这些限制,才造就了传统译论中一再讨论的不可译现象。

前文在梳理关于不可译现象的文献资料时,发现这方面的研究语料主要集中于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领域。这背后也有深刻的认知原因。因为在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中,文学作品比其他的文本类型都更看重人文性,也可以说是语言表达的艺术性和个性,不但要有表达的内容(“说什么”),同时强调表达的形式(“怎么说”)。换言之,在其他文本类型中,形式和内容的地位并不平等,形式的重要性往往排在内容之后,因此译者可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优先保留内容而舍弃形式。但在文学作品中,形式已经上升到和内容同样重要的位置,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形式比内容还要重要,最明显的是文字游戏,如双关、拆字等,以及诗歌里面的藏头诗、回文诗、异形诗等。汉语对联在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谐音联:“因荷(何)而得藕(偶)?有杏(幸)不须梅(媒)!”拆字联:“人曾是僧,人弗能成佛?女卑为婢,女又可称奴!”

形式方面的限制越多,翻译的难度就越大。如果难度太大,往往让常规的翻译方式束手无策,于是不可译现象也就由此而产生。然而,源文是否可译并非固定不变,翻译史上常有译者在因缘巧合的情况下,灵感爆发,写出让人拍案叫绝的译文。就以前面的幽默故事3为例,钱歌川曾巧妙地将英语中的语义双关(order-beer)换成汉语中的谐音双关(要喝—吆喝),从而将其翻译成“教授敲着桌子喊道:年轻人,你们要(吆)喝什么?全班齐声回答:

啤酒!”这样精妙的译文,既不需要做任何解释,幽默感又跃然纸上,效果不输于源文。

还有其他一些原本认为不可译,后来却出现妙译的例子。如在毛主席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最后一句表达得别有情调:“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其中“红装”“武装”同属偏正结构,仅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则大相径庭,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许渊冲将其创造性地翻译成“Most Chinese daughters have a desire strong,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其译文中的“powder the face”“face the powder”也同词异序,对比鲜明而又相映成趣,取得了不亚于原诗的表达效果。

对于像上面这些译文,突破了常规的翻译方法,充满了奇思妙想,才是本文要研究的“创造性译文”,这样的译文连同其翻译过程才是本文要探讨的“创造性翻译”。对于这样精妙的译文,我们在欣赏、敬佩之余,还很想追问:其中有没有什么翻译原理或操作规律?如果创造性译文真的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那就会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根本没有什么客观的翻译经验可以总结,遑论将其推而广之?幸运的是,尽管目前译界对于创造性翻译还主要停留在定性研究和经验主义阶段,但翻译研究中的“认知转向”已经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宝藏的大门,让我们得以窥探“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过程,并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我们在下文中将主要借鉴关联理论、认知语言学中的语义概念化过程和概念整合理论对创造性翻译展开分析。就笔者的实践经验而言,对于源文中像名词之类呈静态特征的节点型语言的翻译,可结合语义概念化过程进行“分析—参照—转换”,而对于源文中像动作或关系之类呈动态特征的路径型语言的翻译,则可以借鉴心理空间理论进行“分析—参照—转换”。

3 创造性翻译:认知诠释与实践操作

3.1 语义概念化过程与拆字翻译

杭州西湖的湖心亭上,有一石碑刻有“虫二”两字。传说是当年乾隆下江南,夜游湖心亭,被西湖美景吸引,于是刻字于碑,以示留念。我们可以先根据关联理论进行“明示—推理”,获得源文中的最佳关联:乾隆皇帝既然被美景折服,甚至不辞辛劳地写下“虫二”两字,肯定是为了表达他对西湖的赞赏之情,只不过由于他身份特殊,加之可能要卖弄斯文,所以故意把这层意思包装在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字眼上,让旁人不能一下子看出他的真实用意。但我们只要在这个大前提下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虫二”实乃繁体字“風月”去除外框,以此寓意“风月无边”而已,此为汉字常用的拆字联想,《三国演义》中记载曹操在

视察花园修建情况之后,在门上写一“活”字,意为此“门”太“阔”。所以曹操也是典型的在玩弄拆字游戏,意图保持一种神秘感,让旁人莫测高深,其心理和乾隆如出一辙。

对乾隆皇帝题字心理的揣测,其实就是对“虫二”进行认知解构。如果我们根据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还原它的语义的概念化过程,其特征在语义激扩网络中可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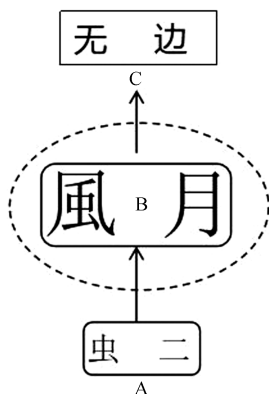


图1 “虫二”的语义激扩特征

由于这涉及到汉语拆字,构成了传统译论中的不可译现象,即中文的字形和意义不能在英语中同时保留,于是对它的翻译有两种,一种是音译“Chong Er”,另一种是意译“THE FAIRYLAND”(朱安博等,2022)。不过,这样的译文,尽管从翻译方法上看没有问题,却未能把中文的精髓在英语中保留下来,让译文读者既无法理解中文拆字的巧妙,也不能诠释“风月无边”的寓意,甚为可惜。在这里,笔者建议我们可以仿照“虫二”的语义激扩网络,把“FAIRYLAND”也拆解成两部分,留下“FAIR AND”让英语读者浮想联翩(It's a Boundless Fairyland),或许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下面也附上译文的语义激扩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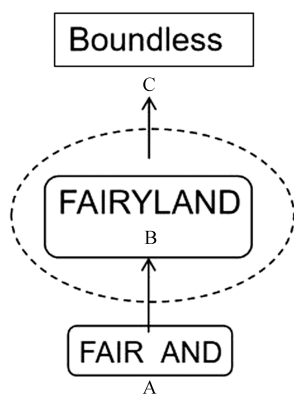


图2 “FAIR AND”的语义激扩特征

3.2 概念整合理论与双关语的翻译

在伦敦地铁,写着一幅标语:Less bread. No Jam.

这句话是英语中典型的语义双关,如果将其字面翻译成“少点面包,不加果酱”,肯定

不能和地铁这个特定环境建立起合理的逻辑联系。虽然我们还是可以像上例一样,借助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还原它的语义概念化过程: bread 和 jam 除了可以表示日常生活中的“面包”和“果酱”以外,在地铁这个特定的语境中,还可分别表示“养家糊口讨生计,挣辛苦钱”以及“乘客拥挤,交通堵塞”。但我们发现,从认知难度上判断,这次在句子层面的概念化过程已经远远超过了前面基于短语的概念化过程,何况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将还原出的概念化过程照搬进汉语环境,并在它的指导下筛选出恰当的译文。由于涉及的认知操作关系复杂,并且涉及动态关系,笔者的建议是借助概念整合理论进行跨心理空间的映射,以便我们把握源文和译文之间较为复杂的对应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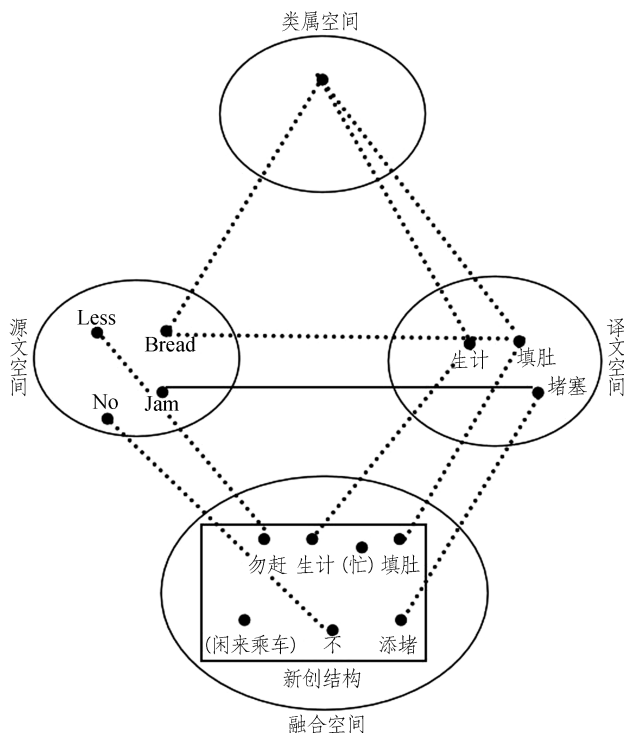


图3 “Less bread. No Jam” 的概念整合互动

概念整合理论包括四个心理空间,即上图中的源文空间、译文空间、类属空间和融合空间。源文中的“jam”能够直接映射进译文空间(实线连接的“堵塞”),但“bread”最直接、最典型的意义“面包”与语境不兼容,不能直接映射进译文空间,必须先进入类属空间,获得其语义概念化之后的非典型意义(虚线连接的“填肚”)以及更抽象的上位概念(虚线连接的“生计”),才能映射进译文空间。然后,源文空间的动作关系(less、no)和译文空间激活的语义节点(“生计”“填肚”“堵塞”)全部进入融合空间。在这儿,映射进来的元素经过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和扩展(elaboration)等整合加工之后,涌现出源文空间和译文空间都不存在的两个创造性元素(“忙填肚”“闲来乘车”),从而形成了一个新创结构(图中用方框表示)。于是,伦敦地铁的标语经过概念整合之后,最终的译文出来了:“勿

赶生计忙填肚,闲来乘车不添堵。”

译者在进行创造性翻译时,如果能有意识地将四个心理空间中的信息相互映射,彼此连接,构成一张“概念整合网络”,那就正如吉尔·福柯尼耶和马克·特纳 (Fauconnier et al., 2002:42)所指出的那样:“整合产生了输入中所没有的新创结构,整合所特有的新创结构有奇特的性质,具有创造性。”因此,王寅(2020)非常重视融合空间中的新创结构,认为这从理论上为格式塔心理学所倡导的“ $1 + 1 > 2$ ”的整体论提供了一种认知理据,特别适合研究翻译中的创造性思维。

3.3 高难度拆字:语义概念化+概念整合分析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如何翻译幽默故事2。这个故事由于涉及同一个单词的连续两次拼写变化,所以对译文形式的要求就更为苛刻,我们只有在还原三个单词的语义概念化过程的基础上,再将其投射进类属空间进行概念整合分析(它们的语义激扩图和概念整合网络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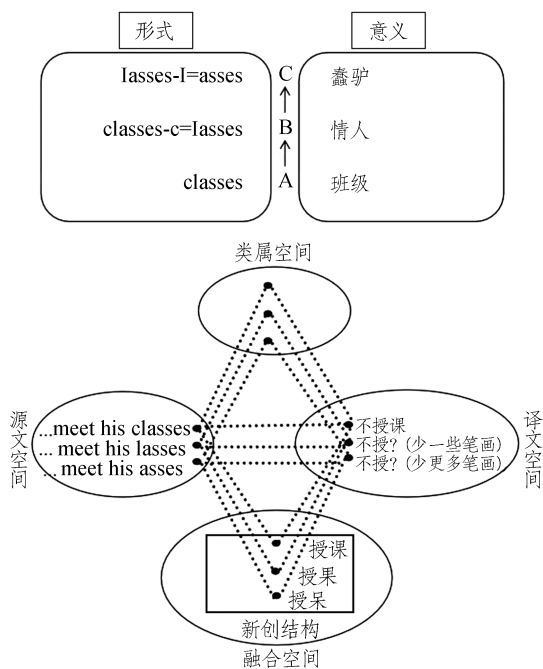


图4 “Class-lass-ass”的概念化特征+概念整合互动

在上图中,源文中的“Class”“lass”“ass”由于不能直接投射进译文空间,必须在类属空间还原它们的概念化过程(在形式和意义两个维度上产生的联系和制约),再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映射到译文空间,即:用汉语中的某种表达传递“今天教授不授课”的意思,但该表达可以先后通过削减其中的偏旁部首或组成笔划,形成另外两种不同的表达,然而意思分别变成揶揄教授和嘲讽学生。于是在融合空间的新创结构里,就可以产生“授课”“授果”和“授呆”这样看似和源文字面意思相去甚远,但从认知作用上却非常相似(通过字形的删减而导致意义的歪曲,从而产生幽默)。我们得出的参考译文如下:

(通知原文)劳里教授今天不授课。

(学生擦除部分笔划后的通知)劳里教授今天不授果。

(教授继续擦除更多笔划后的通知)劳里教授今天不授呆。

循着同样的思路,借助语义概念化和概念整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更多高质量的译文。
比如:

(通知原文)劳里教授今天不补课。

(擦除“补课”的部分笔划)劳里教授今天不裸。

(继续擦除“裸”的更多笔划)劳里教授今天不呆。

甚至,我们在概念整合的时候更大胆一点。虽然源文中学生的调皮表现为擦除单词的一些字母,但如果他们采取的是相反动作——给单词增添一些字母,是否也能达到相同幽默效果?如果答案肯定,那我们就得到一个更加精简,同时还带有押韵效果的译文:

(通知原文)劳里教授今天不教课。

(给“课”增添笔划,揶揄教授)劳里教授今天不教裸。

(给“裸”修改笔划,揶揄学生)劳里教授今天不教骡。

4 结语

“戴着镣铐跳舞”曾是翻译史上的经典比喻之一。这个比喻用来形容翻译赋予译者的创造性极为恰当。但本文只讨论了翻译实践中体现译者创造性的一种最极端的形式:即如何把“语言不可译现象”变为“可译现象”,或至少是相对满意的“可译现象”。本文认为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把握语言表达所蕴含的认知特征。为此,笔者结合认知语言学中的语义概念化和概念整合网络,分析一些传统译论中认为属于“不可译现象”的例子,并提出了相对可行的译文。

如果译者在实践中变“不可译现象”为“可译现象”的这一过程证明了翻译是一门化不可能为可能的艺术,那其中起到化腐朽为神奇作用的灵丹妙药就是实现翻译的“认知转向”(王寅,2008),即我们要把翻译从本质上看成一种认知活动,是动态发展(翻译过程)和静态结果(最终译文)的辩证统一。而正是基于翻译的这种认知本质,本文才不认可传统译论中的“绝对不可译论”,相反,本文坚持认为,翻译中出现的不可译现象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同语言之间具有可译性才是绝对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译者在实践中遇到的翻译障碍到底属于“可译现象”还是“不可译现象”其实是一个动态概念,所以昨日的不可译,到了今日可译;相反,今日的可译,到了明日有可能不可译,这些都是翻译中的正常现象。

参考文献:

- Catford, J. 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A. M. & E. F. Loftus. 1975. ASpreading-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Processing[J]. *Psychological Review* (6): 407-428.
- de Groot, A. M. B. & R. Poot. 1997. Word Translation at Three Levels of Proficiency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Ubiquitous Involvement of Conceptual Memory[J]. *Language Learning* (2): 215-264.
- Dryden, J. 1997. The Three Types of Translation[G]// R. Douglas.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Manchester: St. Jerome, 172-175.
- Fauconnier, G. & M.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 House, J. 1981. *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M]. Tübingen: Narr.
- Lamb, S. 1998. *Pathways of the Brain: The Neurocognitive Basis of Languag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angacker, R.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lmkjær, K. 2019. *Translation and Creativity* [M]. London: Routledge.
- Mounin, G. 1963. *Les Problemes The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M]. Paris: Editions Gllimard.
- Nida, E. A., & C. R. Taber.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 J. Brill.
- Steiner, E. 2021.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and Cognition[G]// F. Alves & A. Jakobse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London: Routledge, 344-359.
- Wikipedia. 2023. Transcreation[EB/OL]. [2024-03-31].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3A//en.wikipedia.org/wiki/Transcreation>.
- 陈友勋. 2011. 认知翻译法[M].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郭建中. 2014. 创造性翻译与创造性对等[J]. 中国翻译(4): 10-15, 128.
- 黄德先, 殷艳. 2013. 译创: 一种普遍的实践[J]. 上海翻译(1): 29-33.
- 钱歌川. 1981. 翻译的基本知识[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谭业升. 2012. 创造性翻译中的交互视角化[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6): 83-87, 126.
- 王向远. 2015. 以“逐译/释译/创译”取代“直译/意译”——翻译方法概念的更新与“译文学”研究[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132-142.
- 王寅. 2008. 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化”对翻译主客观性的解释力——一项基于古诗《枫桥夜泊》40篇英语译文的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3): 211-217, 241.
- 王寅. 2020. 概念整合理论的修补与翻译的体认过程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5): 749-760, 801.
- 文旭, 罗静纯. 2023. 翻译中的创造性认知过程——基于科幻新词的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4): 583-594, 640-641.
- 周领顺, 彭白羽. 2024. 翻译研究中的“性”字术语: 现象与分析[J]. 外国语(2): 107-116.
- 朱安博, 伟圣鑫. 2022. “风月无边 翻译有度”——“虫二”现象不可译性程度问题研究[J]. 中国翻译(4): 22-29, 190.

A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Transcreation: A Case Study of Untranslatable Phenomena in English and Chinese

CHEN Youxun

Abstract: Transcreation is inherently and closely linked to untranslatability 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Academic literature researching untranslatability indicates that, in terms of its cognitive essence, translatability is absolute, while untranslatability is relative. However,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 conversion of untranslatable phenomena into translatable ones is a dynamic process, with the key lying in integrating the theories of semantic conceptualization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 from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r translators to produce translations with the same or similar cognitive effects, they must accurately grasp th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implied in the source text, project them into different mental spaces, and carry out a serie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s.

Key words: transcreation; untranslatable phenomena; the cognitive turn; semantic conceptualization; conceptual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朱晓云